

【网络社会治理专题】

网络集体行动的意义建构

——基于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的分析

梅梅^{1,2}, 何明升³

- (1. 哈尔滨工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2. 东北林业大学 文法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3. 华东政法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 上海 201620)

摘要:网络集体行动的产生依赖于行动者对于“事件”的意义建构。运用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分析网络集体行动的意义建构具有一定的解释力。网络环境下,信息发起者、行动参与者与媒体相互影响,对事件进行着动态性的编码和解码,不断地赋予事件以意义。网络集体行动的意义建构中很难截然分开编码者和解码者,事件的编码经过多主体的共同努力,而解码方式呈现多元化。网络行动者在彼此的互动中不断地构建并完善事件的意义,推动着集体行动的发展。

关键词:网络集体行动;意义建构;编码;解码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420(2015)03-0024-06

互联网改变了世界,同时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方式和改造方式。人们通过网络平台发表意见,表达诉求,甚至为维护利益而发动或参与大规模的舆论攻势或现实的集体行动。大规模的网民在相对自发、无组织和不稳定的情况下,以社会管理和公共事务为话题,在网络上发布和传播信息,表达言论、制造舆论和促发行动的群体性努力,被称之为网络集体行动。网络集体行动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仅限于语言表达,如网络舆论、网络谣言,这类网络集体行动的特点是基于共同的关注点而进行的意见、态度和观点的表达;另一类是基于网络或利用网络的行为表达,如人肉搜索、网络群体性事件,这类网络集体行动的特点是有明确的行动目标和实际行

动,可以是网上行动,也可以发展为网下行动。

关于集体行动是如何发生的,社会建构理论认为,不同背景的行动者之所以能够聚集一起共同关注某个社会事件,是因为该事件被赋予了某种意义。也就是说,只有当社会问题或事件被大规模的网民感知并赋予其特定意义时才会引发网络集体行动^[1]。因此,网络集体行动的产生依赖于人们对于“事件”不断的意义建构,而“意义”的生产和传播存在着“主导的复杂结构”^[2]。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提出需要在“生产、流通、使用、再生产”这种“主导的复杂结构”中研究大众传播过程。斯图亚特·霍尔虽然是针对电视话语提出的编码-解码理论,但是这个模式可以运用于任何话语生产的分析中。本

收稿日期:2015-06-28 本刊网址:<http://nysk.njupt.edu.cn>

作者简介:梅梅,东北林业大学教师,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在读,研究方向:网络社会学、社会管理研究。
何明升,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网络社会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2&ZD08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2YJA84000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HIT. HSS. 20122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DL12BC20);黑龙江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2D080)

文将运用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分析网络集体行动中话语意义的生产与传播过程。

一、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

在《电视话语中的编码和解码》中,斯图亚特·霍尔提出“事件必须在电视话语的视听形式范围之内符号化”,“这个事件在变为可传播的事件之前,必须要变成一个‘故事’”。也就是说,任何种类的信息传播都不是自然生成的,在信息发送之前必须对它进行重新构建。因此,电视产品首先由信息的发送者“生产”出来,即信息的编码。信息的编码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包括“知识构架”“生产关系”和“技术基础结构”的影响,具体而言信息编码受到制度结构,传播媒介和方式,编码者的知识结构、技术水平、职业道德、价值观念,社会以及历史地界等因素的影响。信息编码完成之后,便经过“流通”环节进入接收者的视野,即信息从编码者被传送到接收者。信息的“使用”和“再生产”几乎是同时进行的,霍尔认为,编码的信息一旦被传送,编码者便失去了控制权,接收者获得信息的同时根据自身的“库存知识”(stock of knowledge)进行解码,再创造出信息的意义。由于信息的编码者和解码者之间的关系和地位的结构差异,以及二者的符码之间的不对称性,造成了解码者的三种解读方式:主

导-霸权解读、协商解读和对抗性解读。

网络环境下集体行动的意义构建通过信息的编码和解码的过程完成。由于网络媒介不同于电视媒介的新特点,在网络场域下信息的编码与解码产生了新的变化。第一,网络话语的意义建构更加复杂,是在信息发起者与行动参与者、行动参与者与行动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中不断地编码与解码,此间编码者与解码者并没有清晰的界限。第二,信息发起者依据自身的知识、社会关系和结构对信息编码,以能够被行动参与者所解码的符码构建意义,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引起行动参与者的关注和认同。第三,信息发起者的背景复杂,不再仅仅是所属某个媒体机构的专业人士,很多情况下是以“私媒体”的形式发布个人化的信息,其对信息的编码更加容易脱离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第四,行动参与者在信息发起者所编制的符码范畴内解码,同时在自身的社会文化背景下重新编码,不断地构建出新意义,并呈现多元化。第五,行动参与者能够轻易地观察到其他参与者的编码,参与者的解码受其影响。第六,行动参与者编制出的话语意义会向其他舆论领域扩散,常常引起其他媒介的关注并形成互动态势,此时其他媒介同样对事件进行着解码与编码并进一步构建意义。网络集体行动中话语意义的建构过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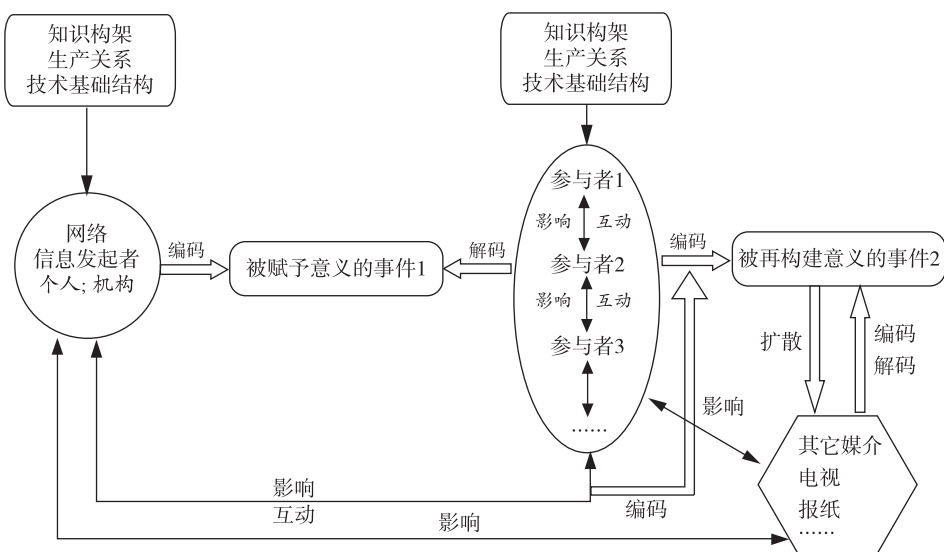


图1 网络集体行动中话语意义的“编码-解码”模型

二、李天一案件中的编码与解码

1. 案件背景

李天一,现用名李冠丰,著名军旅歌唱家李双江和梦鸽的独生子。2013年2月17日晚,李天一伙同他人在某宾馆内轮奸一女子。2013年2月19日,北京市海淀区分局接到女事主报警。2013年3月7日,李天一等人因涉嫌轮奸被依法批捕。2013年7月8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李天一等人涉嫌强奸一案向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3年8月28日,李天一等人涉嫌强奸一案在海淀法院正式开庭审理。2013年11月27日,李天一一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宣判,李天一等人被处以相应的刑罚。李天一在未成年时(15岁)因寻衅滋事被判处较轻刑罚,曾经引起社会关注,又因其李双江独子的身份,被赋予“富二代”“官二代”“红二代”等多重意义,此次案件发生舆论一片哗然,社会公众普遍关注案件的发展。

2. 编码:集体行动意义的生产

李天一一案并不是经过一次编码就完成了意义建构,而是随着事件的发展经历了多重主体的多次编码。信息发起者、行动参与者以及媒体之间在不断的互动中进行着编码与解码,集体行动的意义不断地被构建乃至达成共识,成为推动网络集体行动前进的动力。

(1) 发起者的编码

斯图亚特·霍尔指出,不赋予“意义”,就不会有“消费”。那么李天一一案被发起者赋予了何种意义呢?而这种意义为何能吸引大规模网民来“消费”呢?

李天一一案最先由新浪微博上实名认证为“香港《华南早报》网站编辑”的网友王丰-SCMP爆料,他既是信息的发起者,也是事件的第一次编码者。该网友于2013年2月22日11:04,发布一条微博“北京来电:海淀公安分局昨天晚上以涉嫌轮奸刑事拘留了一名叫做‘李冠丰’的年轻男子,名字虽然改了,但还是有人认出来他真正是谁”,并附有李双江之子李天一介绍的网页链接,暗指涉事年轻男子就是李天一。

首先,王丰-SCMP是一位网站编辑,具有极强的专业水平,能够精准地把握新闻的要旨和爆点,他运用了“北京来电”(隐喻:神秘的高层、内幕消

息)、“名字虽然改了”(隐喻:在中国普通人改名字是很难的,有门道的人才能办到)、“认出来他真正是谁”(隐含意义:此人肯定让你大吃一惊,点击吧)等能够引起网民兴趣的词语,一步步地引导网民打开“网页链接”,最终揭露这个人就是李双江的儿子李天一。王丰-SCMP的这条爆料微博看似是在揭秘,事实上他通过一条简短的微博,成功地给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贴上了“特权阶层”和“可能的内幕交易”的标签,再次唤起了网民对社会阶层之间不平等的愤慨,进而加入到事件的讨论中,形成了网络中草根阶层的舆论场。李天一曾经于2011年因殴打一对夫妇被收容教养一年,当时舆论场内的一个关注点即是李天一可能因为是李双江的儿子而被判处较轻刑罚。李天一的再次犯罪迅速地引发网民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在王丰-SCMP对信息进行编码之前,“北京来电”的主体已经对信息进行了一次编码,虽然这次编码影响了王丰-SCMP,但是由于这次编码并不是网络集体行动意义建构的初始,因此不被考虑在内。

(2) 参与者的编码

行动参与者的编码与解码同步,参与者对意义解码的同时也在编码。在信息发起者所编制的符码范畴内,行动参与者依据自身的社会处境、价值观念、认知结构对已经建立起来的意义进行解码和编码,当参与者将自己的解码以评论的方式发布之后,其评论就构成微博文本的一部分,可以当做是对微博文本的第二次编码。

王丰-SCMP在2013年2月22日11:04发布微博,第一个参与者的评论(内容:真的假的啊……)在当天11:05发布,最后一个参与者的评论(内容:现已尘埃落定)在2013年9月26日23:07发布。事实上,如图2所示,该条微博在发出后的2个小时(13点)后转发数(1026次)和评论数(267条)达到峰值,在12个小时后只有偶尔零星的参与者进入微博进行评论和转发。2013年2月22日下午14时左右,各门户网站均对该微博予以转载,并向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分局咨询,随后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分局发布通报证实李天一等人因涉嫌强奸罪被刑事拘留。因此随着消息被证实和其他舆论平台的建立,网民开始转战其他舆论场所,以更新信息,表达观点,构建意义,进一步地推动集体行动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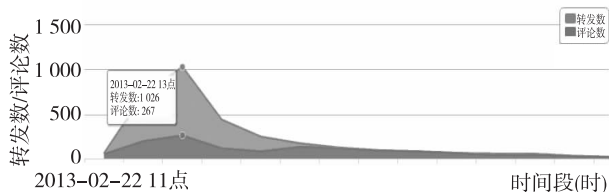


图2 转发数/评论数的时间(12小时)趋势图

该微博被参与者广泛转发,32%参与者一次转发,23%参与者二次转发,16%参与者三次转发,29%参与者四次转发。其中有10位关键传播参与者,他们的评论被多次转发,通过他们的评论可以考察行动参与者的编码过程,详见表1:

表1 关键传播参与者的评论

| 参与者微博名称 | 内容及评论 |
|-----------------|--|
| 发起者:王丰-SCMP | 北京来电:海淀公安分局昨天晚上以涉嫌轮奸刑事拘留了一名叫做“李冠丰”的年轻男子。名字虽然改了,但还是有人认出来他真正是谁 http://t.cn/zYC30EE |
| 参与者: 王丰-SCMP | @平安北京 改名的事也值得查查。是上次出事后改的呢,还是干脆又弄了个身份证?这年头好像挺流行这个的 |
| 上海官微精选 | 点开链接,看到的是:“李天一,1996年4月出生于北京,父亲李双江、母亲梦鸽均是知名歌唱家……” |
| 新民周刊杨江 | 又犯事啦? //@鲍志恒:坑爹,坑死爹。 //@王丰-SCMP:@平安北京 改名的事也值得查查。是上次出事后改的呢,还是…… |
| 文苑阁大学士 | 李双江的这块“小小猪排”哟! //@何光伟:不改名会死吗? |
| 私家野史 | [吃惊] //@费明微博:[转发] |
| 大头费里尼 | 李双江之子 |
| 王亚军北京 | 双江没有赶赴现场赔礼道歉? |
| 孟静 | 我想起的是归辛树两口子,归家起码还是因为孩子身体不好才溺爱的,这位壮得跟牛犊似的 //@反裤衩阵地:按说这种小孩儿应该是…… |
| 东方卫报 | 有媒体已第一时间致电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工作人员求证此事,对方证实,李双江之子李冠丰(原名:李天一)确实已被刑事拘留,具体细节不方便透露。2011年9月年仅15岁的李天一曾因殴打一对夫妻被刑事拘留,随后双方达成和解。最终性格还是决定命运。有一句话挺适合李天一的一——红歌“罩”你去战斗…… |
| 程旻 cy | 真是他? //@神气飞天猪:看来完全没有改造好……不知进去以后有没有书法歌唱比赛? |

如表1所示,其中,王丰-SCMP作为信息发起者,又根据参与者的评论,在11:43分提出了“改名的事也值得查查”“还是干脆又弄了个身份证?”两个问题,其隐含的意义与元微博所构建的意义相互呼应,通过再次编码强化“特权阶层肆意妄为,需要监督”的意义。

上海官微精选揭示点开链接之后的内容,节选李天一的父母背景,即“父亲李双江、母亲梦鸽均是知名歌唱家”。由此构建李天一的“富二代”“军二代”的身份意义,继续强化李天一案件的“特权”意义。大头费里尼的评论“李双江之子”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妙。

新民周刊杨江、孟静和王亚军北京了解2011

年李天一因打人被劳教的事实,在已有的认知基础上,提出了李天一缺乏家教、父母有责任的新意义。

东方卫报通过向官方证实而落实了李天一犯案的事实,并在此基础上重提2011年李天一的旧案以和解告终,并用“红歌‘罩’你去战斗”讽刺李双江护短的事实。同时暗示网民需要监督李双江是否还会利用关系“罩”孩子,提示可能发生的“暗箱操作”,新的意义被构建出来。

通过考察参与者的编码,可以发现,随着网络集体行动的发展,信息发起者和行动参与者不断地进行意义构建,最终形成能够引领集体行动的共识性意义。

(3) 媒体的编码

2013年2月22日下午14时左右,各门户网站均对李天一案件的首发微博予以转载,赋予意义的信息开始向网络的其他舆论平台流动。受到网络舆论的影响,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也纷纷报道李天一案件,赋予意义的信息开始向网下舆论领域扩散。各类媒体通过对信息话语意义的重新编码,不断地进行意义构建。网上、网下媒体之间的相互建构推动着网络集体行动的发展。

3. 解码:集体行动意义的再生产

在网络话语意义的建构中,编码与解码阶段很难截然分开,它们总是交互着同时发生。信息发起者和行动参与者在编码的同时对文本进行解码。集体行动的参与者按照自己对世界的认知解码文本,从而获得意义^[3]。相对于信息发起者对于信息的首次编码,行动参与者的解码是集体行动意义的再生产。网民的评论能够体现他们的解码立场。下面以李天一案件爆料微博的评论为文本,分析网络集体行动者的解码。在微博发布后的12个小时内的评论文本中,分别截取前20分钟、评论峰值附近10分钟、最后20分钟的评论作为研究对象,考察行动者解码中的意义构建。

微博发布后的前20分钟内(11:05—11:25),共有13名行动参与者,发表了12条评论。其中有2名行动者转发微博并@他人,由于这2名行动者没有评论,所以不能观察到他们的意义建构。在12条评论中,4条评论在求证真相;5条评论批评李天一的人品;2条评论指向李双江的人品问题;还有1条评论是给发布者点赞,归类为其他,详见表2:

表2 微博发布后20分钟内评论中的意义建构

| 意义 | 评论条数及比例 |
|-------------|---------|
| 求证真相 | 4(33%) |
| 指向李天一人品(负面) | 5(42%) |
| 指向李双江人品(负面) | 2(17%) |
| 其他 | 1(8%) |

微博评论和转发峰值附近10分钟内(12:55—13:05),共有87条评论,其中有9条转发无评论。在其余的78条评论中,12条评论求证真相;25条评论批评李天一的人品;15条评论

指向李双江的人品和教育方法有问题;8条评论认为李天一前次犯错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7条评论讽刺李天一的家庭背景;还有11条评论没有具体指向,更多的充满了幸灾乐祸的情绪,归类为其他,详见表3:

表3 峰值附近10分钟内评论中的意义建构

| 意义 | 评论条数及比例 |
|------------------|---------|
| 求证真相 | 12(15%) |
| 指向李天一人品(负面) | 25(32%) |
| 指向李双江人品、教育方法(负面) | 15(19%) |
| 2011年李天一打人处罚轻判 | 8(10%) |
| 讽刺家庭背景、以钱权谋私 | 7(9%) |
| 其他 | 11(14%) |

微博发布后的第12个小时的后20分钟内(22:44—23:04),共有21条评论。其中,8条评论指向李天一的人品;3条评论指向李双江的人品和教育方法有问题;1条评论认为李天一上次犯罪处罚较轻;2条评论认为李天一辜负了他的“军二代”身份,而军队背景有助于他脱罪;还有7条评论没有具体意义,更多的是行动者之间与主题无关的回复,归类为其他,详见表4:

表4 第12个小时的最后20分钟内评论中的意义建构

| 意义 | 评论条数及比例 |
|------------------|---------|
| 指向李天一人品(负面) | 8(38%) |
| 指向李双江人品、教育方法(负面) | 3(14%) |
| 2011年李天一打人处罚轻判 | 1(5%) |
| 讽刺家庭背景、以钱权谋私 | 2(10%) |
| 其他 | 7(33%) |

通过三个不同时段评论文本的分析可以看出,行动参与者的解码呈现多元化,这种多元化意义超出了信息发布者最初的意义建构。行动参与者根据信息发布者的编码、自身的“库存知识”以及其他行动参与者的编码,来解读意义,同时构建出多元化的意义,例如李天一的“坑爹”、李双江教子无方、李双江依靠特权帮儿子脱罪等。其次,随着时间的发展,事件的意义逐渐地开始多元化,但其核心意义一直被不断地构建

并完善。在微博发布后的20分钟内,虽然加入评论的行动者不多,但是已经提出了李天一“坑爹”和李双江教子无方这两个一直被不断构建的核心意义。当发展到微博转发和评论高峰时,大量的行动者参与讨论,又继续构建出李天一的特殊家庭背景有可能帮助他如两年前一样判处较轻刑罚的意义。

三、总结

网络集体行动的产生依赖于人们对于“事件”不断的意义建构,而意义的生产和传播即在行动者的编码与解码之间完成。运用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分析网络集体行动的意义建构具有一定的解释力。通过研究发现,网络媒介中集体行动的话语意义的编码和解码,与电视话语中的编码和解码相比,产生了新的特点。首先,网络集体行动中意义构建的主体主要由信息发起者和行动参与者组成,有时也出现可能的其他媒介渠道与前两者发生互动,并在三者相互建构中完善事件的意义。其次,经过信息发起者的编码、行动参与者的解码和编码到其他媒体的解码和编码,事件的意义被生产出来并不断

地更新,呈现动态编码的特点。网络环境下编码者和解码者很难截然分开,编码者会对不断变化的意义进行解码,而解码者也根据情况赋予事件以新的符码。再次,被赋予意义的事件一旦被发布出去,便脱离了信息发布者的控制,行动参与者的解码呈现多元化趋势,其构建出的多元化意义常常超出了信息发布者最初赋予事件的意义。

总而言之,运用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分析网络集体行动的意义构建过程虽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仍然存在不足。例如,编码-解码理论并没有能够说明编码者和解码者是如何在自身的知识构架、生产关系以及技术基础结构的影响下进行意义的选择性建构,这是后续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白淑英,崔静. 从意义建构到共识达成——关于网络集体行动的一个解释模型[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10-16.
- [2] 斯图亚特·霍尔. 编码解码[G]//罗钢,刘象愚. 文化研究读本.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351.
- [3] 范敬群. 网络话语意义的生产与传播研究[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114-117.

Meaning construction of cyber collective actions: An analysis based on Stuart Hall's encoding-decoding theory

MEI Mei^{1,2}, HE Mingsheng³

1. School of Management,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01, China
2.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Harbin 150040, China
3.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620, China

Abstract: The occurrence of cyber collective actions depends on how cyber actors construct the meaning of “events”. Stuart Hall's theory of encoding and decoding has certain explanatory power in analyzing the process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of cyber collective actions. Under the cyber environment, the information publisher, action participants and media have a mutual influence, dynamically encoding and decoding the events, and constantly giving meaning to them. It is difficult to distinguish clearly who the encoder or decoder is in the process because the encoding is done by multi-agents' efforts and that the decoding mode is also diversified. Cyber actors in their interaction constantly build and complet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vent,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llective actions.

Key words: cyber collective action; meaning construction; encoding; decoding

(责任编辑:刘云)